

穆旦是现代汉语诗歌领域尤为出色的诗人,他早早便立下志向,这一生要为汉语诗歌的发展贡献力量。《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以穆旦的生平经历为脉络,紧密结合他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完整且细腻地叙写了穆旦作为诗人的精彩一生。书中不仅展现了穆旦个人的成长轨迹,更刻画了一位在铁与火交织的艰难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形象。作者深入挖掘、追踪勘测了他诗歌创作的源头,探寻其诗歌背后的时代背景、情感脉络与思想内涵。

本版刊发《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书评、创作谈,走进穆旦用诗歌构建的精神世界。

——编者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邹汉明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

在20世纪中国诗坛的现代性探索中,穆旦的诗歌创作与译介始终惹人注目。他的人生轨迹与战乱时局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相互映照,成为时代裂变下的独特注脚。

穆旦的现代主义诗风源自其深厚的西学背景与跨文化视野,然而特殊的时代背景曾使其诗学成就长期被遮蔽,人生轨迹亦湮没于历史烟尘。历时17年,作家邹汉明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重探这位诗人,通过大量档案爬梳与史料钩沉,复原了穆旦鲜为人知的精神史。

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穆旦研究资料的空白。穆旦的一生恰似一曲“咏叹时代动荡,追寻金色光芒”的命运交响。传记上部聚焦其前30年人生;从浙江海宁的家族根系,到天津出生后的北迁背景;从南开中学的文学启蒙、清华园的智性淬炼,到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勃发。青年穆旦的成长轨迹,始终贯穿着对民主进步思想的追寻。他因卓越的外语能力投身远征军翻译工作,命运与战争紧密纠缠,文人本色使其怀抱理想主义者的眼光。在诗学判断与价值取向上,穆旦始终保持着超越时代的现代性视野——这种精神特质,恰是邹汉明为其立传的深层动因。

从美国自费留学归国后,穆旦的远征军经历成为难以言说的隐痛,其人生叙事亦因缺乏自我

言说的“英雄性”而充满断裂与迷团。邹汉明摒弃传统传记的线性铺陈,转而以“散点透视”与“诗解秘史”的笔法,将史料考据与诗性阐释熔于一炉。他并未沉溺于史料的堆砌,而是以现代主义诗人的敏锐触觉,在传主与时代、作品与史料之间保持审慎的距离,通过克制且舒缓的叙事节奏,还原穆旦精神世界中现代性生长的动态过程。

传记文学常陷于“还原历史”与“重构灵魂”的二元困境。邹汉明选择了一条更富张力的路径:他以严谨的文献考据为骨架,以诗性解读为血肉,让穆旦的形象始终隐现于史料与诗行的缝隙中。这种若即若离的书写策略,既避免了单一结论的武断,亦使传主与时代乃至整个世界的复杂关系得以立体呈现。

穆旦生于1918年,一个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历史节点。穆旦的精神历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求索。邹汉明将个体命运嵌入宏阔的时代图景,最终完成的不仅是一部诗人传记,更是一份关于现代性如何在困厄中破土而出

于时代洪流中发现诗性之光

——简评邹汉明新作《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尤 佑

的精神档案。正如穆旦诗中所言:“在耻辱里呼吸的,要开出倔强的花。”

青年穆旦的成长是一段隐秘的奋斗史。因为自述资料的匮乏,邹汉明采访了唐湜、郑敏、杨苡等人,并到南开大学档案馆搜寻穆旦留下的线索和迹象,以“现代诗人成长记”为脉,运用草蛇灰线的写法,以昆明、重庆、北京、沈阳等具体可感的生活空间为经线,同时以吴宓、赵瑞麟、王佐良、郑敏、罗友伦等人的回忆为纬线,紧紧围绕求学、西南联大迁徙、远征军、野人山逃生等事件,以点带面,全面展现穆旦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成长史便是记忆史。某些记忆川流在行动和语言中,它穿过某地并迂回前行。邹汉明深谙“记忆的主观性”和“时空的秩序性”,他找到了更贴近传主心灵的诗篇,以此更贴近灵魂的真实。而涉及爱情,邹汉明以万卫芳、曾淑昭、梁再冰、周与良为感情线,勾勒出一个渴望爱情与温暖的多情诗人形象。

毋庸置疑,穆旦的情感细腻而真挚,初恋万卫芳是天津的名门之后,从情感上给予诗人以安慰,也给予他“失恋的苦果”;曾淑昭是诗人在中航公司的恋人,他们有着一致的审美,是诗人心中永远的玛格丽;梁再冰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因诗结识,穆旦对其有爱慕,也算是一种“诗性苦恋”;最终,穆旦与周与良修成正果,在美国留学期间完婚。《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也就在这样的美好中结束。如果这是一个生命路口,穆旦永远停在那个瞬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阅读此传时,我发现邹汉明有意规避所谓的“身份确认”,比如:著名爱国诗人、“九叶诗派”代表诗人、中国新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等,而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呈现穆旦的创作风貌。此为这部传记的一大特色,邹汉明以诗心写他传,将心比心,以人性的发展揣摩诗人的现代性生长,而又将个体人物的命运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至于诗解秘史,定会引起争议。多数人认为

诗歌偏于感性、轻逸,很难再现厚重且多维的历史。在诗与史哪一个更可靠的问题上,陈寅恪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史书往往因史官的视角而产生偏差,他还举例说《唐史》里,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难以厘清,结论自然不一。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于是,诗有可能成为更真实的史料。邹汉明客观地分析穆旦诗学的变迁与跃升,同时也还原了穆旦“普通且传奇”的人生。

从解读《春》《赞美》《出发》《诗八首》《旗》《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战士》等作品看,邹汉明以“形式整齐”贯穿穆旦的学院派风格,也隐含穆旦沉稳的性情、“骄傲于自己的血”的热忱与孤傲。我甚至认为,穆旦的诗不是晦涩,也非完全的“现代主义”,而是紧贴世界时局的厚重之思。“火焰、深渊、死亡、赞美、赤裸、泥沼、小兵”等词语,无限贴合现实与人生的境况。细考穆旦的诗学变迁,除了受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和美国诗人威廉·休·奥登的影响之外,穆旦更多的求索还是在西南联大的文教传统中探索汉语新诗的现实功用。穆旦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观点,他的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范畴,进入“众人等于一人、一人等于众人的世界”,这一理念与徐迟的“抒情的放逐”、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闻一多的“要把诗写得不像诗”的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穆旦也因此成为汉语新诗中“搏求者”的典型。

在穆旦这里,如何用文学改良人生乃至社会,不仅见诸诗歌,更见之于他主编的《新报》。而在邹汉明的传记里,穆旦的求索则贯穿现代汉诗的生长和整个时代的变迁。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穆旦的一生,深陷“热情、彷徨、苦闷、抗争、远行、沉寂、耻辱、笃行”的境遇,可他仍然倔强地保持诗人的“良善、纯粹与孤傲”,祈愿得到自由和幸福之花。

(作者系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穆旦原始档案。拙著第二部得以顺利完稿,离不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沈方,诗人,十数年来持续不断地谈论诗歌的老友,写作中,每遇到手头缺少相关的资料,首先就想到请他帮我下载电子书。由此,很多与穆旦有关的文档,只要我报上书名,他就耐心地在网上查找、下载并整理好发我。这些史料,大大方便了我的写作。

海宁一位不知其名的收藏家,知道我在写传,辗转要到我的电话,给我寄来了他从拍卖行竞拍来的穆旦手写材料(复印件)。另一位收藏家老友,竞拍时,意外看到流失的穆旦手写材料,当场拍了照片发我,供我写作时参考之用。

此传撰写期间,我的女儿邹宜笑正在南京师范大学就读,利用高校校园网的便利,她也帮我下载了不少相关书籍和论文资料。此外,她的导师、著名评论家何平教授曾托她带来一大本自行装订成册的穆旦研究论文资料集。何平兄最后还郑重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在此,我深鞠一躬。

感谢穆旦长子查英传,许多年前的越洋电话仍回响在我的耳边。感谢天津小说家秦岭先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元青教授、南开大学档案馆张兰普先生、小自在南开大学校园长大的穆旦同事张文彬之子张尊先生等。感谢译林出版社副总编陆志宙女士和责任编辑张黎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艰辛努力。本书付梓之际,欣闻获“2024年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特此致谢。

最后,我要感谢南开大学一位不知名的老人,在天津高铁站乘往八里台的公交车上,我巧遇这位退休多年的老人,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她告诉我,很多年前,她在南开校园里远远地见过低头行走、若有所思的穆旦。因为同在一个校区,她那时对诗人的不幸遭遇也有所耳闻。老人叹息一声之后,就跟我讲起了那些年的南开往事。临别的时候,这位眉清目秀的老人特意走到我身旁,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她的两个手掌中,然后,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用那根苍老而颤抖的食指,在我的手心里认真而动情地写了一个字。我没有记住这个字。但是,我记住了她跟我说的一句话:“今我不述,更待何时。你做的是有意义的事!”闻听此话,我心头一热,觉得十多年的资料搜集以及近一年高强度的写作期间所有遭遇过的困难都不值一提了。这也许是传记作者得到的最好的安慰,何况这句话,我何其有幸,能够当面从一位经历了往事的南开老人那里听到。

我把这一切,看成是冥冥之中的穆旦找到他的对话者并热情赠予他的一种特殊的缘分。感谢这位传奇的翻译家和诗人,其卓越的才华和丰沛的一生,20多年来默默滋养着我的写作。我想,这正是和了诗人的一行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作者系作家、诗人)

■创作谈

探寻穆旦的文学人生

□邹汉明

穆旦是谁?
我最初只知道他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铮,查家的良字辈。明清两代,查家是海宁的望族,出过不少中国文化史上卓有建树的人物。而最近一个大家都还记得的查氏俊杰正是良字辈的查良镛,笔名金庸,武侠小说一代宗师。这是很容易发生联想的。

事实上,穆旦终其一生都没有到过海宁。早在20年前,他的长子查英传在电话里跟我委婉地确认此事时,我惊讶得相当无知。及至后来,我遍查穆旦的史料,也只知道他曾坐火车路经海宁,至于脚踏海宁的实地,确乎找不到任何的记载。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乡一直骄傲于他的文学成就,始终把他列为了当地的文化名人。说起来,这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就目前所见,穆旦归国后,在必须填写的各种表格上,籍贯一栏,他都认真地填着“浙江海宁”四字。毫无疑问,海宁有着这个北迁家族的根脉。

我的老家桐乡与海宁毗邻,风俗相近,民多往来。我最初大概是从海宁对外宣介的小册子上知道穆旦的。或许自己也是写诗的缘故,一看见就很自然地关注到他。然而,习诗之初,我更早知道的是出生在硖石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而非穆旦。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和穆旦,一前一后,海宁竟然奢侈地拥有两位大诗人,这种文化上的卓特,或曰双峰并峙的奇观,太不同寻常。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着徐志摩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有少数人也在严肃地谈论穆旦的受难。而对于中文世界这无限的少数人,穆旦的诗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进来的一道光,足够给芸芸众生以安慰和希望。如实说,在我看来,穆旦的现代诗,经过岁月的淘洗,比起徐志摩或其他声名煊赫的诗人,读上去更加耐人寻味,更有那种嚼劲。

早在1996年9月,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二十世纪桂冠诗丛”。当时尚在《诗刊》社工作的邹静之先生给我邮寄了这套书。收到后,我用3天时间读完了那册李方编选的《穆旦诗全集》。掩卷沉思,感慨不可谓不多。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全面、细致地阅读穆旦,不仅读了他的诗,还怀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书后附录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对于诗人的生平,这次我总算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对穆旦诗的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我们这些沉迷于新诗创作的年轻人,都喜欢阅读翻译诗体诗,至于本国的新诗传统,则很少注意,更遑论研究。但自从读到穆旦,我开始认识到,他的150余首长长短短的现代诗,已经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汉诗文本。这个新诗的文本极具创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稳定、坚固,且带有一种大时代的语调,足以让创造它的诗人不朽。

阅读穆旦3年后,因为写作,我从桐乡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调入嘉兴市秀洲区文化馆。刚到嘉兴那会儿,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租住在市中心干戈弄的一个小套间。干戈弄的一头,靠南即嘉兴市图书馆,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常去嘉兴市图书馆下属的秀洲书局闲坐,喝杯热茶,随手翻翻琳琅满目的旧书,倘运气不错的话,可以淘到与穆旦有关的资料。可以这

实话实说还没写。他告诉我得抓紧时间写。据他所知,国内有研究者正赶写着穆旦的评传。电话那头,听得出来,陈先生的话语是轻松的,全然不似初次交流时的那种沉闷和生涩。但这回轮到我支吾了。其实,关于这部计划中的传记,由于资料搜集的难度,我差不多已经在打退堂鼓了。

二

2003年11月底,我赶去温州老城区花柳塘采访诗人唐湜。这一次,幸亏有当地作家程绍兄弟的介绍和陪同,我很顺利地采访到唐湜。而且,还意外地获赠他书架上多余的一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应是唐湜《忆诗人穆旦》一文的两册样书之一)。唐湜见过高穆旦,很早就写过穆旦诗歌的长篇评论,尽管他那时因小中风,话不多,且语多含糊,但从唐湜那里疙疙瘩瘩听来的穆旦,也给了我一种如在目前的亲切之感。

2004年1月31日,新年正月初十,在林莽和邹静之两位先生的介绍下,我去清华大学荷清苑采访诗人郑敏。在郑敏家里,我跟她愉快地聊了一个下午。临走,郑先生拿出《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送给我,告诉我可到附近的文印店复印一册。穷书生为了节省一点复印费,书中那几篇稍长且已有收集的文章我就跳过没有复印。所以,现在我手头保存的这册特别的纪念文集,根本就是缺页而不完整的。

北京采访结束,我又南下去了天津,走访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在天津诗友的帮助下,这次在南开东村采访到穆旦的邻居、同事辜崇高、董泽云夫妇,也部分地获得了诗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一些有意思的生活细节。辜先生后来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因担心采访时口头表述有不恰当的地方,他特别关照我以信中的文字表述为准。辜先生经历过非常时期,谨慎缘于他们那一代人背负的生活经验。其严肃如此,也颇令我动容。

也许是机缘巧合,在与穆旦交往密切的当事人中,我还采访过来新夏和杨苡。来新夏2004年来嘉兴参加图书馆的百年庆典活动,我跟他在秀州书局见面,坐下来听他聊他的“棚友”穆旦。来先生跟我讲到特殊时期他与穆旦一道打扫游泳池和厕所的往事,讲的人和听的人,仍都感觉异常沉重。而杨苡,早在2004年的时候,我曾致信问候,可惜当时未联系到她。不料15年后的2019年10月,经“青春诗会”诗友吴兵兄的介绍,我终于走进杨苡的书房。这一年,杨苡已过百岁,其思维之清晰,记忆力之好,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事先已有电话联系,杨苡也有所准备。我们非常愉快地畅谈了一个下午的穆旦。临别,她亲自送我到小院子的门口,还一再地指引我回返的路径。我跟她说,希望过段时间能够再去看望她,杨先生说了一句:“欢迎!”顿了一下,睁着那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很有个性地告诉我:“我很少说欢迎的!”我跟杨苡的长谈,自然也纳入相关的章节。回家的路上,我慨叹万千,甚至觉得,杨苡以她异乎寻常的长寿,似乎正等待着这一场关于穆旦的长谈。感谢这位睿智而直爽的老人为我带来了一个立体的诗人形象。

2005年3月,我突然收到伯良先生签赠的《穆旦传》。这是诗人穆旦的第一部传记。收到的当天,我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记得电话里他转而问我,我的《穆旦传》写得怎么样了。我

三

在最初的一些采访和资料收集完成之后,我因工作调动以及专注于诗歌创作而中断了穆旦的研究。其间,我不时听到朋友和众多文学前辈传话给我,希望我写出《穆旦传》,这其中包括这些年研究穆旦硕果累累的易彬博士。而我却以年纪大一点再写也不迟为理由,一再地推延着传记的创作,直到2018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将一篇旧文交微信公众号“采蓝小调”推送以纪念诗人诞辰一百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主持“文学纪念碑丛书”的编辑魏东读到推文后,通过其他朋友,问到我的邮箱并发送邮件,询问我“有没有继续推进的打算”。我当然愿意。就这样,几番沟通,他报送了选题。半年后出版社通过了选题,我这才着手《穆旦传》的写作,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我顺利完成了两卷本37万字的写作。可以说,没有素昧平生的魏东的盛情推动,传记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一年动笔,或者我压根儿就不会这么快地去完成它。从这个角度说,应该郑重感谢魏东兄,正是对他严肃的传记文学的推崇,以及对于诗人穆旦的理解和热爱,最终促成了这部传记的诞生。但好事多磨,书稿2020年2月交付之后,排版并校对,封面也已设计完成,却一直未能下厂付印。这一搁就是4年。也是机缘巧合,书稿兜兜转转,终于找到译林出版社,蒙译林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女士青眼有加,书稿最终得以出版。

回想起来,穆旦跟译林的缘分,还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3月,印刷量巨大的穆旦译著《普希金抒情诗选》(上下)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手头正好保存有这一版本)。需要说明一下的是,2023年1月,译林社出版了杨苡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关于穆旦的回忆,虽然也不多,但它有鲜活的细节,又有情义,是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这次趁书稿最后校改的机会,我摘引两段,补入拙著,也算是对穆旦至交杨苡先生的一个纪念。

自李方首次编辑出版《穆旦诗全集》、陈伯良首次撰写出版《穆旦传》以来,穆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做得最为完备的,应该是中南大学的易彬先生。易彬所著《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相继出版,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易著相当翔实,完全想象得到当年他采访、搜集资料的艰难。拙著《穆旦传》的完成,受惠于易彬兄近年的研究实多,行文中引用之处,我都一一注明,但在此我仍要由衷地说一声感谢。

此外,我还要给朋友和家人送上这迟到了数年的感谢。

东君,小说家,20多年的老友,他曾陪同我采访唐湜,还给我网购到不少唐湜和穆旦研究的书籍。特别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帮助我联系到南开大学档案馆,让我顺利查阅到该处保存完好的



译林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